

对周、田村和丁论文的点评

岛村 恭则

SHIMAMURA Takanori

翻译:宗 晓莲

在开始于意大利的维科(Giambattista Vico,1668-1744)的反对启蒙主义、反对霸权主义的社会背景下,融合了德国的赫尔德(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, 1744-1803)、格林兄弟(雅各布·格林1785-1863,和威廉·格林1786-1859)的文献学,以及贾斯特斯·莫泽(Justus Möser,1720-1794)的乡土社会研究,之后传播到世界各地,在各个地区独自发展形成的这一学科(discipline),正是在东亚地区称之为“民俗学”的、今天在座的我们所从事的学问。围绕这一“民俗学”,在维科的《新科学》(1725)发表后近300年的今天,在北京,东亚三国的民俗学者相互比照理论、思考,探讨新的时代背景下民俗学理论的应有形态,我对本次研讨会的召开感到无比喜悦,同时其所显示的民俗学研究的未来信心倍增。

本次会议上我的任务是围绕周星、田村先生的发表内容,进行简要点评。下面请容许我作20分钟左右的发言。

围绕媒体,特别是现代网络媒体的民俗学研究,进入2000年后,在美国非常兴盛。以纽约州立大学波茨坦分校的Trevor J. Blank副教授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Robert Glenn Howard教授为代表的目前30多岁的民俗学者们积极加入了这方面的研究。已经出版了由Trevor J. Blank主编的Folklore and the Internet: Vernacular Expression in a Digital World (2009)和Folk Culture in the Digital Age: The Emergent Dynamics of Human Interaction (2012)等论文集。另外在研究互联网的民俗学时,有必要对原有的tradition概念进行重新思考,有关这一主题,Trevor J. Blank还主编了Tradition in the Twenty-First Century: Locating the Role of the Past in the Present (2013)。

上述的论文集收录了很多分析很深入的文章,不过这些论文都是对互联网上出现、传播的文本Text(文字、图像、画像、动画)进行的分析,而没有对作为物质的媒体或作为制度的媒体的研究。前一段时间,笔者曾与短暂逗留日本的犹他州立大学的民俗学者Lisa Gabbert教授说起此事,他说,“确实如此,在美国,有关智能手机本身的研究有很多,而有关智能手机如何被使用的研究还没有出现”。可以说,这方面的研究确实还欠缺。

而今天两位学者的报告在对文本保持了关心的同时,还对媒体自身如何在人们的使用中“存在”进行了探讨。对这一问题,田村教授发表了有关“广场舞”的民族志,周教授也介绍了很多相关事例。至于在德国相似研究的情况可以期待下午李相贤教授的发表。至少,在东亚民俗学研究中,学者们不仅关注媒体的文本,有关“媒体如何活在主体,人,的使用中”这样的视点也开始明确地被提出。我认为,这一视点具有从本研讨会现场向世界民俗学发信的价值。更具体地说,如果Trevor J. Blank或Robert Glenn Howard等美国民俗学者就在本现场,我们和他们会展开什么样的探讨,而

这些讨论又将如何深化相关研究，这一视点可以带来怎样有启发意义的思考。在这一意义上说，非常希望将来能够举行我们东亚三国的民俗学者与美国、德国等世界各国的民俗学者一起探讨问题的世界民俗学研讨会。

回过头来说，不管是对媒体的文本、还是对媒体自身的研究，民俗学对它们进行研究时，民俗学独特的视点、研究框架如何体现，有关这一问题，笔者的思考如下。

笔者在于2014年发表的拙作《folklore 研究是什么》（该论文的中文版翻译正在进行，预定刊载于《日常与文化》的第4期）中，提出folklore“是为了把握folklore研究对象而设定的概念，‘是在拥有某种共同背景的人们（folk）之间产生、存在的经验（experience）、知识（knowledge）、表现（experience）’，与high culture、elite culture，以及mass culture、popular culture有关联，但在概念上与诸如此类的各种文化有区别”。而对于folklore的性质，笔者也准备了如下的补充：“由于是‘生存’于某一特定的文脉中，folklore带有非正式（informal）、非官方（unofficial）、非制度（not-institutional）的性质”。

换句话说，folklore中原本既有着诸如此般，也就是作为非正式（informal）、非官方（unofficial）、非制度（not-institutional）而产生、存在的东西，也有着“由于其正式性（formality）、官方性（officiality）、专门性（speciality）而被赋予特征的制度（institution）、组织（organization）、知识（knowledge）、表现（expression）、表象（representation），以及作为这些内容的总体的体系（system）”，在共有某种共同背景的人们之间“存活”，从而也具有了非正式（informal）、非官方（unofficial）、非制度（not-institutional）的性质，也就是也成为folklore的东西。

进行了上述的定义、说明后，我们就可以明白，folklore不仅可以研究文本=表现文化（expressive culture），同样可以探讨各种存在的、活着的经验、知识（顺便提一句，Trevor Blank将folklore定义为“创造性的面向外部的表现（outward expression of creativity）”，笔者则在expression之外，加入了experience和knowledge）。另外，将在今天下午发表的丁秀珍教授的发表原稿的开头部分，在引用鲍辛格（Hermann Bausinger）的同时，作了如下的阐述：“今天被称为‘民俗’的，就是‘媒体或公共的实践system的副产品’”，这一视点也可以纳入“由于存在着，从而成为folklore”的论点。

此外还有另一需要阐述的问题。笔者在2014年日本民俗学会年会上，作了《vernacular · tradition · 历时的reflection-folklore研究的理论（1）》的报告，对folklore与vernacular的关系进行了界定。这里所说的vernacular概念与今天诸位发表的主题有着很大关系，因此，请允许稍作说明。

在拉丁语里意味着“奴隶的语言”的vernacular，一般作为“地方的、当地的”意涵而被使用。近年来，在美国的民俗学中被广泛使用、经常提及。其用法既有着简单的作为folklore一词的代用语，也有着更有特点的用法，“对既存的权利有着批判性的文化的特征”也并不少见。例如，Roger D. Abrahams是如此阐述的：

民俗学者应该研究的是，人类的行为。它主要是在集团性的场面中人类创造性的、vernacular反应中产生，是对试图将我们变得无能的力量对抗手段。Vernacular性的无作为、喧嚣等正是主题的中心。人们在讲述现在时，总是在参照过去的惯习的基础上进行相互交涉的。民俗文化由占有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（Ideologie）从大众（volk）或庶民（common man）中导出的时候，也与官方文化的构建进行全方位的对照。戏仿（parody）、讽刺、狂欢（carnavalesque）的动机如果关系到文化生产，其内部、外部的Vernacular活力就得以显现。抵抗运动在畅所欲言地论及压抑的政治体制时，为了维持精神，使用的是政治、社会幽默。还不止如此。Vernacularity还存在于保全论者（Conservationist）的氛围里。也就是说，与消费主义对抗，特别重视再利用、改编、修复、订制，以及对大规模生产及环境的人文关怀（Abrahams

1993 : 5-6)。

Robert Glenn Howard也是在这样的内涵下使用vernacular一词的，他将folklore在网络上展开的情况称为vernacular web。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对网络上有关同性恋天主教（Gay Catholicism）言论进行的民俗学研究（《Digital Jesus: The Making of a New Christian Fundamentalist Community on the Internet》，于2011年出版）。书中提出，作为与主流的（authority）“制度的、官方的基督教”相对，信仰新基督教原教旨主义（New Christian Fundamentalism）及同性恋天主教（Gay Catholicism）等“非制度、非官方的基督教”的人们在网络上构成了vernacular web，在这一过程中，他们的言说拥有了一定的力量（power）。Howard以vernacular authority概念来说明这一现象，当vernacular不断获得力量，以至于成为authority，也就是形成vernacular authority时，是作为与vernacular相对立的authority不同的另一种authority，是获得了社会的力量的。

Howard的理论可以应用于很多事例的解析中。比如2014年香港的雨伞革命。最初示威的学生们只是为了躲避警察喷射的催泪瓦斯，偶然地打开了手中的雨伞，然而这一场面被拍成动画并在网络上传开后，不知不觉中这一示威活动被称为“雨伞革命”，雨伞成为这一活动的象征（symbol）。示威群众进一步将成为象征的雨伞的颜色统一为黄色，将打开的黄雨伞摆放在路面，占领示威场所。更进一步地，雨伞的打开方法、摆放方法也被艺术化。另外，网络上雨伞革命的歌曲也被制作、流行。各种大众传媒将香港发生的这一系列活动在媒体上刊写、报道，于是世界中的人们以“雨伞运动”一词认知了这一香港人的示威活动。如此这般，通过网络，围绕示威活动的各种表现文化＝一种folklore得以产生，它又回流到路上成为现实的示威活动的构成要素，更进一步地又通过各种媒体向世界各地的人们传播、并被人们所认知。这样的过程就可以理解为是vernacular表现文化发展为vernacular authority的过程。

在日本，也可以确认通过网络形成vernacular authority的事例。日本的保育园不足的现象非常严重。工作的妈妈们希望将孩子寄放在保育园，然而保育园的容量不足，接受不了所有希望进保育园的孩子，结果是不能走入社会、参加工作的妈妈也不在少数。这一现象被称为“入托难问题”。一位对此事非常愤怒的人士在网络上投了一篇名为《保育园落选，日本死吧》的稿件：

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是“一亿国民全民积极参与的社会”吗？昨天我孩子漂亮地落选保育园了。这不就不能“积极参与”了吗，我该怎么办？不是说了吗，生孩子、养孩子、出去工作，然后好好向国家交税，日本你还有什么不满呢？什么孩子减少化，狗屁。生孩子也可以，不过几乎不能如期所愿的让孩子进保育园，如果这样说，还有什么人生孩子？（你们官员们）搞婚外情也好，受贿也好，想做什么做什么吧，只要增加保育园。为了奥运会，不是白白花了几百亿吗？什么奥运会会徽什么的，怎么也行吧，开办保育园吧。

如果有钱聘请那些有名的设计家，开办保育园吧。我要怎么办呢，不得不辞职？不要开玩笑，日本。如果不能增加保育园，那便将儿童补助订为每月20万。保育园也增加不了，儿童补助也只能给每月几千元，然后还要说要解决孩子减少化的问题，有那么好的事吗？白痴。国家不让生孩子，想干什么呢？如果有钱，愿意生孩子的人有很多。要不出钱，要不将生孩子、养孩子的费用完全免除。把那些搞婚外情的、收取贿赂的、为了选票送扇子的议员都找出来，将国会议员开除一半，不就有财源了吗？日本你实在是适可而止、别再开玩笑（<http://anond.hatelabo.jp/20160215171759>, 2017/1/13）。

这一投稿用了非常微妙、巧妙的语言（所谓的使用了有效的“粗暴言语”），在韵律上又可以说是

有着诗的感觉，在网络上传开开后，引起了很多共鸣者。以至于在日本国会上也讨论了此事。安倍首相作了“因为是匿名投稿，因此无法确认这是否是实在发生的事”这样答非所问、让各方面惊呆的回答。安倍的说话引起了该文在网络上的进一步传播，各大众媒体也开始讨论此事，举着“落选保育园的就是我”的标语，在国会议事堂前聚会抗议的活动也出现了。事态以各种形式进一步激化，结果，安倍首相不得不承诺“改善保育人员的待遇，积极解决儿童入托难的问题”。如此等等，都是vernacular的表现获得authority，也就是成为vernacular authority，以致对政权这一authority产生影响的事例。

然而，使得这样很有意义的分析变得可能的vernacular概念，在Howard的研究中，并没有就vernacular和authority的关系进行明确的说明。因此笔者尝试在继承Howard有关vernacular的理解基础上，对vernacular与folklore的关系作进一步思考。

具体说明如下：“vernacular表现了folklore所具有的性质的一方面，也就是authority所具有的控制力变得困难，或者说具有了不可能的创造性的状态时。如此这般，当它获得了一定的authority时，这一vernacular就成为vernacular authority。此时，vernacular authority或者是对已有的authority带来一定影响，或者取代原有的authority，又或者不能取代。另外，并不是所有的folklore都可以作为vernacular而存在，而是folklore中的一部分可以看作vernacular来把握。”

如果这样来思考，就可以加深对上文提及的Roger Abrahams有关vernacular论述的理解。另外，接下来丁教授发表的文章中提及的“通过想象的世界(virtual)使现实发生变化从而再次专有的方法”、“从占支配地位的理论的背后，或者是从其内侧，普通人通过专有理论、再专有理论，使得生存于其中的生活样式更为多样、多彩的生活智慧”，作为folklore进行把握就应该成为可能。不过，此时，如果只是简单地说某一现象是vernacular，就只是简单地贴标签，只能使得对象神秘化。作为前提最重要的是，正如丁教授论文中指出的，注目于“依然顽固地支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资本主义的具体机制mechanism”，“一边平衡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，一边对其运作机制的具体形态”，进行“仔细的观察、分析”，这一点有必要再次确认。

上文就是我今天的点评。

文献

- Abrahams, Roger D. 1993, "Phantoms of Romantic Nationalism in Folkloristics", *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*, Vol. 106, No. 419: 3-37 (エイブラハムズ, ロジャー・D. (2012) 「民俗学におけるロマン主義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幻影」『アメリカ民俗学—歴史と方法の批判的考察—』小長谷英代／平山美雪編訳、東京：岩田書院、19-75.)
- Blank, Trevor J. ed. 2009, *Folklore and the Internet: Vernacular Expression in a Digital World*, Logan: Utah State University Press.
- Blank, Trevor J. ed. 2012, *Folk Culture in the Digital Age: The Emergent Dynamics of Human Interaction*, Logan: Utah State University Press.
- Blank, Trevor J. and Robert Glenn Howard eds. 2013, *Tradition in the Twenty-First Century: Locating the Role of the Past in the Present*, Logan: Utah State University Press.
- Howard, Robert Glenn. 2008, "The Vernacular Web of Participatory Media," *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*, 25 (5) : 490-513.
- Howard, Robert Glenn. 2011, *Digital Jesus: The Making of a New Christian Fundamentalist Community on the Internet*, New York: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.
- Howard, Robert Glenn. 2013, "Vernacular Authority: Critically Engaging 'Tradition'", Trevor J. Blank and Robert Glenn Howard eds. *Tradition in the Twenty-First Century: Locating the Role of the Past in the Present*, 72-99. Logan: Utah State University Press.
- 島村恭則 2014 「フォークロア研究とは何か」『日本民俗学』278、1-34。